

*Cannibal Metaphysics*. Viveiros de Castro, Eduardo.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eter Skafish.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2014. 229 Pp.

鄭瑋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在新世紀以來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這波知識浪潮中，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無疑是在理論化工作上最為堅持且最基進的人類學家，*Cannibal Metaphysics*一書完全展現了他遠大的理論企圖。他以Deleuze與Guattari的理論視域與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的啟發，重新解讀、解構並重構了美洲印地安民族誌與Levi-Strauss不同時期的思想特性，為另類本體論的「概念」、「知識」與「理論」提供「哲學」基礎，進而挑戰西方社會科學與哲學對「概念」的預設。其次，作者以關係論立場來整合結構論、象徵交換論（Marcel Mauss）、象徵關係論（Roy Wagner與 Marilyn Strathern）及些許ANT理論的論述，以濃密的概念檢討、嚴謹的理論解析與緊湊的書寫節奏，將本書討論推向法國結構論與後結構主義的內部辯論場域。更重要地，作者認為，該書絕不等同也不能化約為文化相對論（即對傳統原住民知識、人類認知過程或意識過程的探究），因人類之間的差異在於概念與視角，非關理性之有無。

該書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反納西瑟斯」（Anti-Narcissus）以美洲印地安的視角主義為例，證明確實存在一個有別於西方現代性那種納西瑟斯式的本體論（即，以未能擁有什麼[資本主義、理性或基督宗教]來界定非西方和非現代）。作者主張，清楚辨識出那些切合我們研究之集體的思想風格，才是人類學研究的機動力。對比於西方現代性預設了「身體一致而心靈歧異」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美洲印地安人認為人類有共同的身體（自然），唯獨文化與思考方式各異，預設了「心靈一致但身體歧異」的多元自然主義（multinaturalism）：不同人群與物種間的區別是建立在身體／生物（指構成慣習[*habitus*]、精神[*ethos*]與物種所有行為[*ethogram*]的方式或存有樣態之總體）的差異上，無關乎文化／心靈／靈魂。例如，美洲印地安

人與生活於叢林的美洲豹（應理解為：藏身在動物外表下的人），皆視自身為人，以同樣的分類範疇看待世界，以相同原則組織社會體系，且視彼此為非人類。由此，不同人群或物種看待世界唯一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所看到的世界」。凡佔據了宇宙觀上主體位置的所有物種皆為人，而人觀與視角只是程度、脈絡與位置的問題。

猶有進之，這種視「文化與主體為普同之形式（the form of the universal），而自然或客體為特殊之形式」的本體論，係以主體化模式來認識世界，而人是做為大寫他者的形式，因此，認識世界意味著「化物為人」

（to personify the things）：得先知道「物是誰」，才能回答「為什麼」。就此，知識是指「藉系統且深思熟慮的能動外展（abduction of agency）以揭露最大限度的意向性」，視角主義就是保有對同音異義的概念（homonymous concepts）間的確存在著一語多義（equivocation，不同視角位置間的溝通模式）與指涉的他性（referential alterity）的信念。要言之，多元自然主義是非命題（nonpropositional）哲學，係基於掠奪（predation）的形上學之宇宙觀預設，這一點在展現了虛擬親近性（virtual affinity）的聯姻中清楚呈現。事實上，美洲印地安的世界是以食人主義為特徵的他者結構，這個在其關係性想像（relational imagination）中無所不在的母題關涉了當地哲學的三個重要面向：跨物種視角主義、本體論上的多元自然主義以及食人的他性（cannibal alterity）。其中，最能展現視角主義的思想意象（image of thought）就是神話，其預設了異質連續性的本體論體制：轉變先於形式、關係優於條件、間隔內於存在。

第二部分是從人類學親屬理論（Wagner與Strathern象徵關係論為主，特別是象徵的雙重符號學、碎形人、部分關係，以及社會性有如視角的交換）以及ANT理論等視角，重新解讀Deleuze與Guattari在兩卷*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即*Anti-Oedipus*與*A Thousand Plateaus*）的概念和理論，顯明其與人類學理論間的共通與關聯。請容我簡述作者如何解讀Deleuze與Guattari提出的關係性／平的／碎形本體論（relational/flat/fractal ontology）內涵。其一，符號的象徵邏輯體制之鉅變。當代人文社會學科開始拒絕隱喻與再現，強調語用學和協調，造成了符號與被指涉物、語言與世界間的不連

續性，從而更為偏好差別（differential）—碎形、平的多重性、異質元素間的跨類別連結，以及各種力量呈現出的拓撲學連續性。這趨勢意味著符號學邏輯的質變：意指和所指間的同質序列，和真實層（the real）的語音學連續序列之間所形成的群聚不連續性（molar discontinuity），消融為分子組成的不連續性（molecular discontinuities）。處於持續變異狀態的真實層將以下列意象浮現：做為動態的且內在的（immanent）多重性、持續造成差別的關係，以及異質的反意合成（disjunctive synthesis）

其二，有關多重性之性質的問題。首先，多重性的具體意象是根莖，將思想想像為有如活動，是決定思考對象有如強度獨特性的工具，意在廢黜本質與類型這兩個古典的形上學觀念。其次，多重性概念的主要組成係非分類學上差別化的個體化，這是純粹強度差異的存在樣態，以不可化約的不平等為形成世界的條件。至於由異質強度關係所形成的根莖狀多重性，是眾多流變的組裝（assemblage of becomings），更是一部差異引擎。既然物與存有的差異結合或網絡皆為視角，出自於此的多重性亦必含有視角。多重性擁有內在度量且只代表（或再現）其自身，既無法造就結構上的一致，也無法帶來超越。最後，關涉多重性的哲學是建立在反意合成（或說內含分裂）的關係樣態（即流變）之上。

其三，關於研究者如何以象徵邏輯體制的特性來統整樹狀模式與根莖模式所呈現的流變及多重性的問題。Viveiros de Castro提醒我們：Deleuze與Guattari並不認為樹狀與根莖狀是彼此對立的模式：前者以超越的模式運作並進行追溯，後者則以內在的過程運作而能顛覆模式，並勾勒地圖輪廓；模式恆常處於建構或崩解，過程則恆常自我延長、斷裂與再起。猶有進之，他們述及眾模式的二元對立，是為了抵達能挑戰各類模式的過程，以消解那些他們不想建構卻必須經過的二元對立，最終尋獲「多元主義即一元論」的魔法公式。正因為二元對立是真實的而非想像的，且是做為那個過度編碼（overcoding，指資本主義公設的表現，往往導致中心化、一致化、整體化、整合、階序化以及成為定局）之抽象機器的運作模式，此一人為屬性正是他們企圖消解的。更關鍵地，消解並非藉由否定或矛盾的邏輯來達成，而是透過逃離、躲避、流動、滲漏或消失於遠處等方式（統稱為a line of flight或ligne

*de fuite*)。這將關聯到以下問題：我們要如何理解並掌握二元性做為多重性的樣態？

二元性是依據一個能決定最小限度多重性的定期重複模式而被建構及被轉變。每一個概念區辨都要先建立起外延—現實的一極（即樹狀、molar）與內涵—虛擬的一極（即根莖狀、molecular），一旦立場更動，就會改變二元性的性質：樹狀的一極所提出的二元性，會自行揭露其為根莖狀分子組成之多重性的群聚回聲（molar echo）。這兩極的關係是相互預設與表現性（expressivity），二者同等必要且彼此制約，並以不對稱的方式運作（如，整體化的追溯將反過來屈從於根莖狀的無政府解體）。作者認為，前述關係無法被一個外部的、含括性的第三個概念所掌握，正如視角主義（指二元性做為多重性）就是辯證法（指二元性做為一致性）這個普遍律所欲否定的。更重要地，模式與過程間的不對稱關係乃是性質不同的運動：模式旨在實現化（actualization）並減少強度的差異，而過程關乎虛擬的反實行（counter-effectuation）以創造或蘊含差異。前者是做為後者超越的、不可廢除的條件，後者則是流變，是強度的貯存，也是逃離自身被實現化的部分（parts）。作者認為，人類學應討論多重性並使其增生，此處的多重性係指涉「彎折每一個造成二元對立的分線，以成無限複雜的曲線，其目的在於藉折疊（folding）以深化輪廓，令其曲折分散以展現虹彩，終致形成普遍化的半音體系（generalized chromaticism）」。這點是作者撰寫該書意圖達成的。

第三部分「惡魔般聯姻」重新解讀薩滿與食人主義，認為他們並非分屬於圖騰主義（隱喻的邏輯）與犧牲（換喻的邏輯）這兩個對立的象徵邏輯體制，而是結構上的轉變（進而整合Mauss對犧牲與魔法理論的部分論點）。此一定性提供了作者重新解讀美洲印地安人那種反涂爾幹社會學的社會性如何可能之視角。在當地，聯姻與交換（內在於流變）先於父子親緣（filiation）和繁衍（基於外延的與身體性的原則），以敵人為對象的聯姻既危險、脆弱、怪異，卻又關乎政治策略與經濟基礎，而親屬稱謂體系允許人們將姻親關係偽裝成有如血親關係。就此，他者（即敵人）的他者仍是唯一他者（而非「我們」），他性自我出現與存在的基礎，亦即，對他者進行食人般的內部化，乃是自我外部化的條件。事實上，姻親關係才是當地所有社會關係



的本體論條件，也是社會秩序的根本賦予能量（*primordial energy*）。同時，聯姻更是與外部／他性／敵人建立真實關係的掠奪模式，對反於那有如國家的父子親緣與繁衍之想像的親屬體制。猶有進之，聯姻不是社會範疇，而是宇宙觀範疇，其核心是偷竊和禮物，而非資本主義式或契約論式的交換。由此，美洲印地安的聯姻係以掠奪為關係核心的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是反（涂爾幹）社會學的、反（以認親為基礎的）親屬的。

作者在第四部分「食人的我思」（*The Cannibal Cogito*）說明了前述將美洲印地安人的想法（*idea*）等同於我們所習慣的概念（*concept*），不僅是對人類想像與思想自身的實驗，更重新界定了概念所預設之內在性（*immanence*）的前概念基礎、概念所召喚的概念性人物（*conceptual persona*）及其所設想的真實層。其次，另類哲學關注的對象是概念所投射的可能世界，而非供人觀看的完備世界（或世界觀），更不援引政治或經濟這些超越的觀念來解釋世界，而是看重那些關乎世界的內在觀念。就此，該書可被視為同時對被研究者的和研究者的思考所進行的實驗，藉重申二者的差異在於概念與視角，以證成結構論的基本立場。如此一來，我們才可能跳脫社會科學與哲學所假定的各種「決定性」斷裂：*the bricoleur*及其符號和概念工程之間的斷裂、總稱的人類神話生成（*mythopoesis*）和特殊的西方理性宇宙之間的斷裂，以及圖像的聚合超越性（*paradigmatic transcendence*）和概念的組合內在性（*syntagmatic immanence*）之間的斷裂。作者認為，人類學論述與當地人論述是對等的，彼此預設了對方，至於概念則反映了兩種文化間一定的可理解關係。為了讓在地哲學可以被理解，作者認為必須想出一種類比，使其進入我思或單子（*monad*）秩序之列（如，美拉尼西亞那種分裂的人[*dividual*]做為持具的個人主義之類比），以構成理解的部署（*dispositif*）。做為類比的在地觀念包含了眾多構思與想像，由此萃取出的「概念」即是構思間的一種複雜關係，或者說，前概念直觀的組裝。作者以上述融入後結構主義理論特性的視角主義「哲學」與「概念」，重新解讀甚至重新定性了Levi-Strauss晚期思想中隱而未顯的後結構主義色彩，並視其為美洲印地安思想（或哲學）的結構轉變。對比於*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的親屬代數理論，Levi-Strauss在*Mythologiques*一書中勾繪了神話

多重性與流變（即僅有眾微小結構而欠缺單一宏偉結構）的「無結構的結構論」（structuralism without structures），所謂的結構則是處於恆常不均衡（perpetual disequilibrium）之中。作者據此主張，Levi-Strauss建立了一個關係的理論（a theory of relations），一個「結構論流變」的理論。

我認為該書對當代人類學的啟發在於，作者提出了掌握奠基於另類本體論的概念與理論之具體圖像。但關心當代社會的讀者想問的是：如果這個另類本體論的世界並非出現在異文化，而是同一社會因歷史政經條件劇烈變動而致使社會本體論重構的情境中，那麼，該書能提供我們怎樣的理論啟發？

作者尚未有效說服讀者的議題至少有二。其一，作者指出食人的「我思」，實更接近於身體化的我思，是從範疇（以「宇宙政治」置換「社會」）與位置來思考並行動的人，而情感則使人顯得獨特，但行動的後果卻依然無所逃於全面含括的宇宙政治。對照之下，Deleuze與Guattari指出了分裂的人、潛意識與欲望對既存秩序與權力關係的顛覆性，一再強調「流變是欲望的過程」。作者以視角改變來呈現看似對立的象徵秩序與邏輯所構成之眾多微小結構間的增生與轉變（即流變），但他並未證明：在流變的組裝過程中，身體化的視角與分裂之人的欲望，在認識論上與本體論上的差距，如何可能橋接起來？其二，作者認為視角主義的本體論既是結構的也是歷史轉變的，卻又矛盾地強調當地人對他性的態度是掠奪，而非仿效（mimesis），因此喪失記憶及與過去的連結才是關鍵。這點讓讀者無從得知：在歷史與認識世界方式一同轉變的過程中，人們如何重新認識到自己與他人、自己與世界在歷史或時代轉折中的位置與關係？

這本書當然不是人類學史或人類學理論的入門書，而是高階的當代人類學理論專著，我願意推薦給對人類學知識史、人類學理論、哲學人類學以及後結構主義人類學等主題感興趣的讀者。